

北京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成果选编

Beijingshi

Shehui Kexue

Jijin Xiangmu

Youxiu Chengguo Xuanbian

第四辑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成果选编

Beijingshi

Shehui Kexue

Jijin Xiangmu

Youxiu Chengguo Xuanbian

第四辑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编. 第4辑 /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656-2634-0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社会科学—科技成果—汇编—北京市
IV. ①C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8475 号

BEIJINGSHI SHEHUI KEXUE JIJIN XIANGMU YOUXIU CHENGGUO
XUANBIAN(DISIJI)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编(第四辑)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编

项目统筹 马 岩

责任编辑 张成水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北京东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1.5

字 数 574 千

定 价 64.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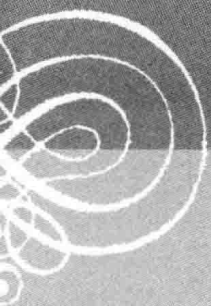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哲学学科	(1)
论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与对策	(3)
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	(11)
科社·党建·政治学学科	(15)
组织绩效视角下的首都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17)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4)
基于社会网络的北京市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规律及其应急 策略研究	(32)
新时期统一战线服务“两新”组织重点群体研究	(41)
首都大学生的“中国梦”认知情况调研	(51)
经济·管理学科	(61)
北京市依靠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与对策	(63)
北京服装创意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72)
首都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83)
北京大中型沼气工程运行效率研究	(92)
北京扩大来京留学生教育规模问题研究	(102)
基于北京的休闲农业升级研究	(108)
以绿色建筑规模化推进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政策与保障 体系研究	(117)
北京市电动汽车供应网络演化的复杂适应系统仿真	(128)
基于低碳发展思路的北京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139)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刘易斯拐点”	(146)
北京市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化对策研究	(155)
生态经济结构视角下北京市产业升级与协调发展研究	(164)
北京市突发食品安全事件应急管理研究	(174)
京津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研究	(187)
首都经济圈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财政空间效应的定量分析	(201)
北京市政务微博发展的对策建议	(215)
从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境遇看北京汽车产业提升竞争力 ...	(224)
北京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运行中政府的风险防范对策 研究	(234)
人口老龄化与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	(245)
北京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研究	(255)
北京市低收入群体现状及社会救助研究	(268)
法学学科	(281)
中外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比较研究	(283)
我国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的现状、问题及解决思路	(292)
教育学学科	(301)
首都 90 后大学生消费观研究	(303)
U-S 协作对北京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力研究	(313)
社会学学科	(321)
社区公共服务建设要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	(323)
应对“白发浪潮”第一波的养老对策、模型与制度建构 ...	(328)
“以家庭为中心”的北京市残疾人服务需求与应对	(338)
历史学学科	(347)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349)

1949 年以来北京城区寺观变迁研究	(359)
从美国留学生看民国时期北京的学术地位	(377)
延庆县古村落调查与研究	(383)
语言·文学·艺术学科	(407)
中国审美文化焦点问题研究	(409)
六十年文学发展综论	(418)
城市·综合学科	(427)
北京市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429)
医改背景下的首都农村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研究	(438)
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	(447)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455)
着力推进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465)
论社会管理视域下的新媒体角色	(471)
加快数字北京建设对策研究	(480)
北京噪声污染调查及防治建议	(489)
后 记	(498)



哲学学科

项目名称：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项目编号：06AgZX026

项目负责人：杨生平

项目信誉保证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论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 文化建设的影响与对策

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叶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自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学、哲学等众多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体系的综合反映，对此剖析必须有宏观、中观与微观等多项思维，并以制度变革为基础对其加以批判改造。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涉及哲学、艺术、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产生后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后现代主义影响深：它既涉及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与反思，又涉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等问题的批判与反思。后现代主义影响广：它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影响，还对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有较大影响；不仅影响观念形态领域，还影响人们日常生活领域。

一、后现代主义及其实质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对它的研究要区分四层不同的意义，即作为词源的后现代主义、作为艺术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作为历史现象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思想观念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34年出版的《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反动’。在1947年出版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也出现过这个词。汤因比用‘后现代’指称西方文明中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西方统治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权衰落，非西方文化抬头、壮大。”^①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出现于绘画、建筑等艺术领域，用以表达一种新的风格。由于这种艺术风格影响越来越大，伊哈布·哈桑把它作为与现代主

^①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义艺术不同风格加以系统研究。真正使后现代主义走向世界舞台,还要归功于利奥塔。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通过对后现代社会知识特点的系统描述,使“后现代主义”一词声名鹊起,随着此书在北美公开出版发行,作为历史现象的后现代主义与思想观念的后现代主义两个问题也浮出水面。不少思想家断言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步入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后现代转向”,并纷纷开始对这种现象进行学术研究与理论追溯。在此过程中,哈贝马斯与詹明信的观点是影响力较大的。哈贝马斯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不少合理问题,但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可以通过重建理性与提倡主体间性的方法来弥补现代性的缺陷,而詹明信则公开提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观点,并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消解深度”“强调平面感”和“取消历史意识”等主张的分析,提出通过认识绘图的方法倡导一种新的乌托邦。

从理论源头上看,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以德里达、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和罗蒂、蒯因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德里达通过对传统西方哲学内在问题的分析,指出了其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局限,并提出了延异哲学思想。福柯通过对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知识构成和发展进程的分析,提出知识型理论并宣称整个西方知识史是断裂历史的观点。伽达默尔通过对海德格尔“在”与“在者”以及前理解等观点的继承,颠覆了西方哲学关于真理是对客观世界正确反映的结论,提出任何解释活动都离不开主体的视界,解释过程就是主客体视界融合的过程。罗蒂等通过对传统实用主义反本体论立场的继承,主张没有核心、没有标准的后哲学多元文化。由于以上后现代哲学流派在反传统哲学时存在明显矫枉过正现象,后来逐步出现了以大卫·格里芬与小约翰·科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把人与外部世界确定为外在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局限,提出有机体与内在关系学说,以试图改变现代性带有的灾难性后果。随着全球化加深与后现代主义影响力增强,后现代主义逐步向社会其他领域发展并逐步衍生出许多次生态的后现代主义流派。鲍德里亚通过对西方社会新特点的研究,提出了消费社会理论;布尔迪厄通过对西方社会与个人实践研究,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等。后现代主义与殖民文化研究结合形成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研究结合形成了新女权主义,与历史研究结合形成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形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另外,后现代主义还与生态等问题研究结合产生了生态社会主义,等等。

从现实实质来看,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综合反映。20世纪初期,是资本主义矛盾总爆发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寻求新增长的时期。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几乎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卷入其中,此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了大萧条,各种社会矛盾总爆发,随之还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不可能就此死亡,更不可能甘

于灭亡，它必然要寻求新的增长点，并以此克服经济危机，确保资本主义持续发展。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逐步进行改革，引入了凯恩斯主义与福特制，加强了国家干预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带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但好景不长，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出现了滞胀危机等新问题。后现代主义正是体现了反对宏观调控与整体控制，追求个性增长与发展的需求。另外，后现代主义也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特殊群体——中产阶层发展需要。中产阶层不同于传统的资本家阶层，他们手中掌握的不是“资本”，而是“符号”，他们是靠所接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性质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的。他们的专长是处理文字工作、金钱与人，他们是处理人际关系、商业和技术关系的专家；他们不是依靠“物”，而是依靠“智能”，依靠组织与协调制造“物”的人们的社会机器而生存。大多数中产阶级以在劳务市场出卖服务而不是以买卖资产赢得利益，从职业而不是从资产中获取直接收入。这是他们同大资产阶层最大的区别。当然，从他们的工作性质来看，他们也不同于以蓝领为代表的社会下层阶层。因为，他们不直接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收入与社会地位也明显高于蓝领阶层。中产阶级这一社会的“中间”性质决定了他们需要一套既不同于大资产阶层又不同于蓝领阶层的文化理念与生活方式：他们需要享乐文化、游戏文化；他们要过的是雅皮士生活，而不是嬉皮士生活。

正如安德森所说，后现代主义内生着反对资本主义以及与资本主义共谋两种力量^①。后现代主义中不少思想家曾猛烈抨击过资本主义制度（如德里达）；但由于他们找不到代替资本主义的更好制度，因而他们的批判更多化为与资本主义的共谋关系。当然，这种转化也跟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激进运动失败有着密切关系。对激进运动失败的影响，伊格尔顿这样总结说：“想象一场遭受重大失败的激进运动。事实上，失败如此重大，以至于它在有生之年已不大可能重新兴起，即使曾经有过这种兴起。我心中的这个失败不仅是政治左派所熟悉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受人冷淡，而且是一种如此明确的招致拒绝，以至于似乎使得这类政治学说传统上赖以动作的那些范式名誉扫地。现在这些概念不是受到激烈竞争，而更多的是被人怀着古物收藏家的宽容趣味加以观照，就像人们看待托勒密宇宙观或邓斯司各脱经院哲学那样。它们和常规社会的语言，现在看来不是非常不一致，更多的是完全不可通约——是不同星球的话语，而不是邻国度的话语。”^②后现代主义

① [英]佩里·安德森著，紫辰等译：《后现代性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② [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华明译：《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页。

与资本主义共谋关系,明显表现在它与当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发展关系上,它成了大众文化发展的意识形态。

从理论特征上看,后现代主义具有反一切体系哲学、宏大叙事与深度哲学的特征,弘扬小叙事与边缘叙事,具体表现是用非本体论代替本体论,用协同论取代反映论,用断裂历史观代替连续历史观,用内在性取代客观性,用不确定性代替确定性,等等。从价值取向上看,后现代主义具有反主体的主体价值、尊重差异的自由价值和反宏大叙事的文化价值等显著特点。后现代主义始终强调个人与边缘群体的价值,主张用发展和开放眼光看待人的价值问题,强调为给他者与未来留有足够的价值空间。这无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这种价值主张以反对群体价值与共识价值为基础,因而很难找到实现它的正确路径。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后现代主义历史终结的思想并没有为我们想象出一个与现在十分不同的前途,那种它奇怪地视作一项值得颂扬的事业的前途。但是在几种前途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的前途,它的名字叫法西斯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最大考验,或者对于任何其他政治信仰来说是最大的考验,它是如何发展到那一步。它的有关种族主义和族性特点,有关同一性思想的偏执,有关总体性的危险和对他者的恐惧的大量著作:所有这些,连同它对于狡诈的深刻见解,无疑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但是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的约定主义,它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和地方主义,它对团结和有纪律组织的观念的厌恶,它的缺乏任何关于政治中介力量的适用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将对它极为不利。它在对抗它的政治对手左派——左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它的对手——的时候,它需要强有力的伦理学甚至人类学基础;缺少这一点的任何东西不可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政治资源。因为这个理由,后现代主义是处于问题的最后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最后部分。”^①

二、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路线调整、西方现代化对我国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知识经济崛起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后现代主义逐步传入中国。虽然中国缺乏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土壤(后现代主义只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化社会的产物),但这并不影响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影响的速度与广度。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了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新思潮。后现代常用的一些词汇,如“话语”“文本”“叙事”“解构”“颠覆”等,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一时间,“人人皆话语,个个谈文本,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景象的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华明译:《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2页。

一大景观。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解构与重叙历史经典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不少青少年以“解构”与“叛逆”作为人生价值的重要坐标。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后现代主义也渐渐纳入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轨道。中国大众文化在追逐利润与票房的同时，也增加了“穿越”与“玄幻”等明显的后现代元素。当然，要全面总结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在此只能就文学、哲学与重点文化问题研究做一简单考察。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形成了带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新思潮，如先锋派文学、新写实主义等。这些小说质疑历史的真实性和决定论的合理性，强调恢复文学的虚构性质，并希望用文学的名义去反抗历史的合理性。格非的《迷舟》、余华的《古典爱情》、马原的《旧死》和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便是典型的例证。在当代一些小说家们看来，文学需要反对一切深度。他们主张文学应该走向生活，但又不赞同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他们要求文学作品应真正返回生活中的真实，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叙述，主张叙述时是一片真空，一片透明，不带丝毫偏见，不掺入半点属于自己的杂质，只原原本本把生活的具象原始地还原出来，以达到一种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现象的而不是理念的真实。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小鲍庄》、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便是明显的表现。当代一些小说家取消了理想、消解了文学的深度，主张作者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使文学更贴近了生活，更反映了生活中的原貌，但事实上却使文学彻底归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加速文学商品化和大众文化的发展。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起到了直接影响的话，那么，它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影响是间接的。这种影响是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哲学问题认可或走向的肯定表现出来的。跟后现代主义哲学一样，国内有不少哲学家公开否定本体论，认为本体论是旧哲学思维模式，甚至有人干脆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批判思路去指认本体论与唯心主义的关系，对之加以彻底否定。还有一些哲学家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提出后现代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同样重要的变革意义，并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重新注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加强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宣传与推广。近些年来，由于本体论现实意义逐步明显，有一些哲学家又改变了以往批判本体论的思路，用从海德格尔与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那里借鉴过来的主体理论提出生存本体论等观点。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学与哲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思维方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它对当代中国一些重要文化问题研究的影响则直接表现在“话题”上。作为后现代主义次生态流派之一——后殖民主义主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全球视域中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关系。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自然是他们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作为中国学者，加入全球化与不

同民族文化关系的讨论本属正常现象,但由于这些讨论都是由后殖民主义理论引发出来的,因而自然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后殖民主义对中国文化问题研究话题的影响主要通过中国文化的后殖民、后殖民中的中国文化和后殖民主义与现代启蒙话语三类问题表现出来的。客观上说,后殖民主义视域中的中国文化问题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既加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推动全球文化交流,又促进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但由于相关问题的争论往往是在缺乏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充分反思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无论是后殖民主义的推进者还是反对者都有一定思想局限性。尽管后殖民主义提出的文化殖民思想是有创新意义的,但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只讲话语殖民不讲话语外的经济与政治殖民,是有明显局限的。文化关系的殖民思考只有把文化自律与文化他律结合起来,才能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

三、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一)必须客观研究与认识后现代主义

要正确评价后现代主义,就必须先正确看待现代性及其实质。现代性是由资本、科技与理性等因素组合而成的,包括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文化制度在内的完整制度体系。这个完整制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用“资本主义”去指称。这个制度体系,在经济上是资本与科技结合,在政治上是民主与法制结合,在文化上是理性与主体结合。文化上的理性与主体既是这个制度体系中的经济、政治派生物,又是它们合理性基础与内在组织机理,甚至是整个制度体系的黏合剂。后现代思想家虽然也涉及现代性中的经济与政治问题,但大多涉猎的是文化上的理性、主体等问题。客观上说,现代性中的理性与主体是有进步意义的,它们在向封建神学讨战中弘扬了人的地位与价值,但也存在有一定问题。就理性而言,它过分强调自身的霸权地位,看不到外部世界的决定作用,忽视自身的弱点(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证明再完美的理性体系都不可能是自洽的);过分强调工具价值,忽视人自身价值。就主体而言,过分强调理论主体、理性主体,忽视现实鲜活主体、非理性主体;过分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忽视世界与人的有机联系;过分强调封闭主体,忽视开放主体。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性与主体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功能效果的批判是深刻的,并由此给整个现代性体系带来了巨大震撼。但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批判上有两个明显缺点:一是思维方式的偏颇。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性时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最初是要批理性、主体和宏大叙事的弱点,可最终却变为对整个理性、主体与宏大叙事的批判。这一点是跟正在西方兴起的复杂性科学相反的。复杂性科学反对还原论中的片面性,却不抛弃还原论,主张整体论与还原论的统一。二是忽视对现代性制度体系的批判。知识体系、文化制度在现代性体系

中占有重要地位，却不构成现代性体系的核心，现代性体系核心应是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整体社会制度。要改变现代性体系的整体性质，就应该从这些制度入手。可对此，后现代主义是无奈且无能为力的。正因为后现代主义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混杂并存，故而不能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态度，必须仔细甄别，区别对待，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

以实践为根本特征、强调人的本质是现实关系总和的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等方面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多重批判，并从根本制度层面完成了对现代性体系彻底改造。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与科技在经济层面的结合，民主与法制在政治层面的结合以及理性与主体在文化层面的结合，对现代性体系构成的确重要，但它们还不是现代性体系的根本。现代性体系的根本还在于这些因素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嵌合在一起。当资本与科技以产权形成固定下来后（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现代性的众多因素就有了凝固特征。而当这一特征与政治统治、意识形态论证与宣传相契合，现代性体系就像牢笼一样稳固。因此，对现代性体系的改造必须是根本制度的变革，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是解放和改造现代性体系的唯一合理之路。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已丧失其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仍是好的社会制度，关键是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现代性体系中的合理因素，改造其不合理因素，实现社会与人的同步协调发展。因此，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来说，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基本前提与重要保障。虽然后现代主义将批判的苗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但同时也影射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公开主张“意识形态终结论”，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助长了这种思潮的蔓延。针对此情，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使命要从“守势”走向“主导”，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要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视角建构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学术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勇于和善于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展正面交锋，要有敢为天下先、用不断创新的话语观点和理论体系引领世界思潮发展的豪情壮志。当然，社会主义制度在建设完善过程中，也要充分吸纳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合理建议，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加强政策引导，完善法制体系，建设公正、合理和有一定张力的文化发展立体体系

文化是多样的，层次是复杂的，就其存在方式而言，有文化事业，也有文化产业，有经营性文化，也有公共服务性的文化，等等。由于后现代主义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多方位的，这些不同领域或层次的文化形式生产和作用方式又有所不同，故而不能采取统一的文化管理思路，

应采用统、分、合的文化政策,并从制度入手加强建设。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很强的解构和破坏功能,只要将它限制在一定制度和政策框架中,它就不可能导致颠覆性的后果。由此,建设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管理与政策机制是防止后现代主义负面影响泛滥的必要前提。由于后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大多数是很重要的现实和学理问题,因而在一般文化事业管理的层面就应该提供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一般理论和学术问题必须在正常的对话和交锋中才能得合理解决,强力的政策控制不仅影响理论和学术的深入探讨,还可能因此而影响现实问题的合理解决。许多学理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纯理论问题,但它们归根到底都是现实问题的反映。若不能把重大理论问题讲清、弄透,它迟早会带来较严重的现实后果。尤其像后现代主义这样在当今西方社会有如此重大影响的思潮,更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由于后现代主义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它不仅能不断创造一些新理论和新观点,还能以创新式思维激活已有的文化资源,因而将它合理移植到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之中是十分有益的。鉴于后现代主义有可能存在以解构主流意识形态来激活大众文化意义的特点,对此可采用立法方式进行规避。当然,在主流意识形态、一般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三个层面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也是相对的,毕竟这三种文化不是绝对分离的,而是互动、联动的。所以,要合理利用这种互动、联动,适时把在一般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中经过深入讨论或现实检验为正确的观点引入意识形态,再以丰富后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引领一般文化事业、大众文化乃至现实社会的发展。

(作者:杨生平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